

是写电视剧的，我恨不得也去写电视剧。给别人文字打工、策划什么的，都做过。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成都完全没有酒吧和咖啡厅，“白夜”生意还算不错。但成都人喜新厌旧，总要到处找新鲜的东西。所以到后来，2003、2004年之后就很困难了。

酒吧是有意思的地方，让我拥有了社会生活，通过往来的朋友，得以认识世道人心。因为“白夜”，我的诗风也有了变化，我也开始写一些城市生活，比如我写过《莉莉和琼——吧台闲坐》。

读禁书的少女年代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家共五个孩子。我看你插队没多久，两年不到又回来了，又上了大学，找了工作，在当时算是幸运儿。那么，你提到的“家庭压抑”来自哪里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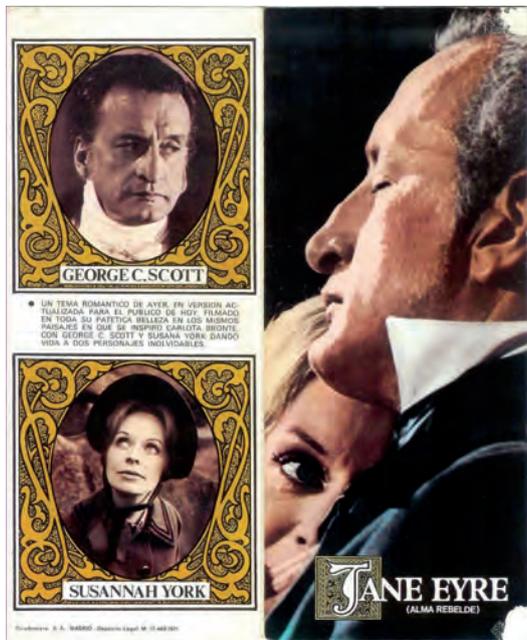
翟永明：主要因为我不是循规蹈矩的人。我们家属于比较正统的，所以我跟家庭的关系有那么一点不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内心压抑、表面顺从；到了某个关键的时刻，爆发。比如我突然辞职，所有人都没料到。我工作的研究所，里面的人特别保守，容不得一点异类。原先所有人都打扮得一模一样，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追求时髦成为一种反叛，可以说是“报复性打扮”吧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这方面就有点异类，要穿戴得比较前卫、个性。最终，这种反叛也导致我跟家庭关系、跟单位关系的割裂。那时候人们看到你稍微穿得出格一点，就觉得你有资产阶级思想，发展到后面甚至觉得你流氓。我当时已经开始写作，跟

一些艺术家有往来，他们长发、留着络腮胡，有时候这些朋友来找我，研究所的人觉得他们是流氓，我一天到晚跟流氓在一起玩，也不是好人。其实，那些“流氓”包括刘家琨、朱成、何多苓、吕玲珑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那个时候，你的写作主要受两条线的影响：一个来自于《简·爱》；另一个是爸爸的藏书，包括《桃花扇》《西厢记》这样的古典戏剧的剧本。你的这两个谱系很有意思。

翟永明：贫瘠的年代，没有选择。就看你跟什么书结缘。那个时候，我看了很多杂书，回想起来，很多还是民国时期的版本。我在《少年杂读记》里讲中学时期怎么杂读，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。那时候除了几部红色经典，其它书基本全是禁书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民间的借书链条：一波爱看书的，有点像一个小小地下组织，大家互相借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流通到你手上的是什么书，你就看什么书。

下图：中国观众更熟悉由李梓、邱岳峰配音的这版《简·爱》电影。



我们班有一个女孩，他父母是收破烂的，当时还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很多人家里面的藏书都不敢留了，全卖出去、扔了。他家收破烂，到处收来以后放家里面，品类丰富。这个女孩知道我喜欢看书，就从家里面拿出来给我看，给同学们传看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看了很多世界名著，比如《简·爱》。同学之间互相流传谁谁有什么书，大家就去借。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满书店都是书，也没人读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如今真的是知识爆炸，全世界的书都有，一辈子都看不过来。

翟永明：对，根本看不过来，而且不知道该看什么书。我有时候到书店一看，从下面堆到上面，我就觉得晕了，不知道看什么了。以前是口口相传，据说有一本什么书好得不得了，大家就到处找来看。另外我记得那会儿看了很多没头没尾的书，因为在不断翻阅过程中，前面已经翻烂了，是什么书都不知道，拿到就读。过了若干年之后，突然读到某一本书是以前看过的，然后才知道名字。记得有一本《三侠五义》，断成两截，书脊勉强连在一块，每一页看的时候，上边这一页翻过来，下面这一页要凑起来看……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。

那时候一本书可能对你产生很重要的影响，《简·爱》对我的影响就太大。说到女性意识，那是很后来的事情了。但《简·爱》这本书，我70年代就看了，并受到了震撼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上世纪到80年代后期，到90年代，才出现了林白、陈染，《私人生活》《一个人的战争》，写女性。而诗歌中的女性立场，